



中西文化交流700年

成晓军 宋素琴 著
林建曾 江立华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教育理论汇编/白 正 王志颖主编,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1

ISBN7-5023-1473-3

(中西文化交流 700 年/成晓军 宋素琴 林建曾 江立华著)

I. 当… II. ①白…②王… III. 教育理论-中国-论文集 IV. 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4435 号

出 版 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 书 发 行 部:北京市复兴路 15 号(中央电视台西侧)/100038

图 书 编 务 部:北京市西苑南一院东 8 号楼(颐和园西苑公汽站)/100091

邮 购 部 电 话:(010)68515544-2953,(010)68515544-2172

图书编务部电话:(010)62878310,(010)62878317(传真)

图书发行部电话:(010)68514009,(010)68514035(传真)

E-mail:stdph@istic.ac.cn;stdph@public.sti.ac.cn

策 划 编 辑:白 正

责 任 编 辑:王 伟

责 任 校 对:苏 程

封 面 设 计:卢明轩

发 行 者: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北京建外印刷厂

版 (印) 次: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开

字 数:170 万字

印 张:162

全 套 定 价:190 元(本册定价:33.00 元)



成晓军 男，1953年8月生，湖南湘乡人。1976年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84年9月至1986年7月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1992年6月破格晋升副教授，1994年7月破格晋升教授。现任惠州大学政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惠州大学粤东地方史研究中心主任。自1976年以来先后出版《禹之谟》、《简明中国文化史》（副主编）、《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谭延闿评传》、《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合著）、《曾国藩家族》、《曾国藩的幕僚们》、《中国近代史新论》（主编）、《燕赵文化纵横谈》（主编）等20多部书籍。先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20多家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10多篇。先后获得各级社科成果奖12项，其中获省部级三等奖4项；获得各级各类科研课题15项，其中参与主持或主持国家课题2项，省级课题5项。曾任国家教委人文社科优秀成果第一届、第二届通讯评委，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通讯评委。现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宋素琴 女，1952年6月生，河北定兴县人。1977年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湘潭大学，获马哲史专业硕士学位。现任惠州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先后在《贵州社会科学》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5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先后主编、参编、合著《毛泽东社会科学思想研究》等书籍10余部。获得各级社科优秀成果奖5项，其中省部级2项；获得省级及厅级和横向社科课题7项，其中省级一项、厅级2项为主持人。现主要从事马哲史及“两课”研究。



林建曾 男，广东梅县人。1943年10月生于贵阳市。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0年7月结业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留院任《贵州社会科学》编辑，现任研究员职务，兼任贵州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多年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贵州地方史。曾先后参加编写《中国近代史记》、《简明中国文化史》、《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州通史》、《帝王家训》、《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及续编；合作主编《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编写《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编选《唐诗选》，参与主编《贵州：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撰写《试论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和态度》等论文近百篇，其中两篇获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



江立华 男，1965年1月生于安徽省歙县千岛湖畔。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1988年在河北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7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主持或参与“传统生育文化研究”、“东亚现代化进程研究”和“转型期英国的经济发展与阶级结构”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出版《东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人口教育》、《中东黑幕》和《中国流民史·古代卷》等著作多部，在《史学月刊》、《现代国际关系》、《史学集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近20篇。

绪 论

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定义与基本线索

1、文化的定义。

在阐述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个问题时,首先有必要对什么是文化的问题作一个明确的界说。

自近代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人们都热衷于文化问题的研讨。可以说,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就有多少个文化定义。从而,谁要讨论文化问题,谁就得首先申明他对于文化定义的所指是什么。

据粗略统计,古今中外关于文化的定义不下 100 种。有人说,文化就是文学艺术;有人说,文化就是文物、文字;有人说,文化就是学术和教育;有人说,文化就是广播、电视报刊和出版;有人说,文化就是思想、人格和道德观念;有人说,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有人说,文化就是人类古来的一切。等等。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观点呢?关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作了分析考察,认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和国家,文化的同容及其表现形式不一样,从而导致人们从各自的文化模式出发,为我所用或随心所欲地给文化规定了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这只是了解到基本原因所在。根本的原因在于:由于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考察问题所持的立物、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从而也就必然要影响到人们对于文化定义的确立的差异性。

我们知道,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然而,

这种现象是通过什么形式反映出来的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试对文化的定义作出如下阐释。

概而言之，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领域，是人们观念形态的反映，是人们意识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①人们经常用各种思维形式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进行精神生产，获得各种知识，以帮助满足自己生活的各种需要。这种精神生产及其产品，以及为了影响人们精神世界所产生的各种传播精神产品的手段、工具等，无疑便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现象。正如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②因而，从上述基本理论出发，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认识：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领域，是人们观念形态的反映，是人们意识的结果。具体说来，它又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哲学、政治思想、宗教、道德观念、文学艺术、美学、科学等；二是传播和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方式和手段，如文字、学校、图书馆及新闻出版机构等；三是群众日常活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要素，如风俗习惯、衣着、饮食、居住、礼仪等。因此，我们在此书中即是持有这样一种比较广泛的文化定义来阐述问题的。

2、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定义。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其主体指的是中国文化，客体指的是西方文化。但讲西方文化，实际上包括了外国文化；讲中西文化，实则包括了中外文化。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定名为中西文化交流史而不得名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呢？原因主要是出于历史的（近代以来）和现实的通常观念来加以考虑的。自近代以来，许多学者都讲中西文化交流这个专有名词。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55页。

体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从外部情形而言,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结果。近代中国比西方国家落后,赶超西方,向西方学习,或者说力求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当今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在西方。因此,为了叙述问题的方便,也为了突出其主线,我们沿用了这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旧有名词。然而,为何又说中西文化交流史包括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呢?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发达强盛主要是在近代,而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从历史的角度说,尤其在隋唐以前,中国与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较多,特别是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较多,即使是在元明时期也基本上如此。

3、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基本线索。

依据前述关于文化、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基本定义,中国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中西科学技术之间的交流。众所周知,文化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关键之一,便是科学技术。从具体到抽象,从物质到思想意识形态,是自然发展的一条规律,也是自然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二条主线是中西学术思想之间的交流。学术思想是在较高层次上地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文科学的精华。学术思想的繁荣、高低与否,反映出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民族中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兴衰盛替,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后人,影响到现实生活。而中西学术思想之间的交流,又可以促使世界范围内文化的继续前进。

第三条主线是中西文学、史学、艺术和生活方式之间的交流。在中国古代,文史结合,文史不分家,并且在其成就方面走在西方国家的前列;而在艺术方面、生活方式方面则体现了中西各自不同的特点。通过这方面的中西交流,可以从一个侧面促进全人类文明的发展。

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具体历史过程来看,它明显地体现了两种文

化双向交流互补的特征。不管是中学西传还是西学东入,相互间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而巨大的。此处暂作简单提示,详细内容拟在各章节具体阐述。

首先谈谈中国文化西传对世界文明产生的影响问题。在中国古代,许多著名思想家很重视从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中考察自然变化和社会变化的传统。这种传统,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曾经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譬如,《周易》通过明末清初在华西方传教士的翻译介绍而传播到欧洲以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就对其称赞不已。据说,他在发明二进制数学时,声称得自于《周易》爻象的启发。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以和为贵等,不仅对古代日本、东南亚各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的企业管理、用人等方面仍然发生着显著的作用。中国的汉字和古代法律、政治制度,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语言文字、法律和政治制度,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如诗词、书画、盆景、园林等,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和中医学,从古至今受到外国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和造纸法、雕板印刷术、航海罗盘、火药和火器的西传,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的丝绸、瓷器,一直被世界各国所珍视所喜爱。等等。

其次谈谈西方文化东入对中国的影响问题。概言之,外国文化的传入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者先后有三次。

第一次是从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国对波斯、大秦、印度、阿拉伯文化的接受、吸取和融合。汉唐盛世不仅是中华民族吸收容纳外来文化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结果,而且是中华民族对主体文化意识的张扬和民族文化发展昌盛的表现。

第二次是在明末清初,许多西方的先进科技通过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介绍与传播,在中国得到了弘扬,对一部分中国官僚士大夫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初盛世局面的

形成,与康熙皇帝等人对西方文化的欢迎态度有很大关系。

第三次是在清朝末年,即自1840年中国开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虽然是被迫的、是不平等的,但它赋予了新内容,给中国人带来了以“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西方文化中的新观念、新技术,几乎影响着整个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综观中国历史上中外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的三次高潮,由于其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从而体现出固有的特点。汉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的这一次高潮,是在中国文化领先世界的环境下和条件下进行的,不存在外来文化输入对中国文化的威胁,中国文化在那时尚少惰性,其主动容纳吸取外来文化的精神是较明显的。从而,汉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基本上体现了平等进行的特色。在中国文化西传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影响的同时,西域和西域以西的文化对中原文化的继续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这两次中西文化交流,则是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从开始衰落到最终解体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下进行的,具有与汉唐时期中外文化、中西文化交流不同的特点:一是明末清初时期,在表面的盛世局势下,在中国文化尚未完全落伍的状况下,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没有较多地遇到人为阻难而在正常运转。然而,由于神学的固有偏见,导致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桥梁角色的西方传教士,在把西方文化传入到中国,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人时,在很大程度上经过自己的筛选而完成的,并非准确地全方位地主持中西文化交流的运转轨迹。更为重要的是,当西方文化对中国人观念形态产生些微现实的冲击之后,中国官方老大帝国的心态立即显现出来,逐渐人为地关闭起中外交往的大门,导致坐井观天,盲目排外,最终被西方文化甩在了后头。二是传统中国被迫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接受,是在挽救民族危亡这个主题的驱使下被迫地、仓促地进行的,从而经历了一个不断深

化的过程,付出了几代人惨痛的心力代价才在近代中国社会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由科学技术发其端,再深入到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层面。近代中国人吸收西方文化中科学与民主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二、学习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1、目的和意义。

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共同财富;这一财富的形成,是通过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双向交流来进行的。因此,我们研究学习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基本目的:既要了解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一面,也要了解它落后的、保守的一面;既要了解西方文化中优秀的一面,也要了解它腐朽的、反动的一面;既要了解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且,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明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是如何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征,最终懂得中西(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需要,只有在新的历史时期,依据中国的实际,有目的、有选择地吸取西方文化(也包括一切外来文化)的长处为我所用,中国文化才能不断创新和发展。总之,在当今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时期,与外国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多了解一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前天和昨天,多了解一点中西(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我们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减少失误,丰富知识,适应社会。

毋庸置疑,学习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其重要意义是客观存在的。如前所述,中国文化既有优秀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保守的一面,通过批判地继承,将有助于我们振奋民族精神,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是因为,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去认真鉴别中国文化的优长劣短,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将使我们为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而感到自豪,增强爱国主义意识;同时又可避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自觉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中也有

落后的、保守的东西存在,它在过去乃至现在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人和社会的进步。进而,通过学习研究中西(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对西方文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它既有优秀的、奋发向上的一面,又有腐朽的、反动的一面。通过批判地继承,我们就能比较自觉地做到有目的地、有选择地吸取其合理的部分,以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做到比较自觉地剔除那些腐朽的、反动的东西,避免步入全盘西化、洋奴哲学、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泥坑。总之,通过学习研究中西(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即可以认识到中西文化之间仍有继续交流、彼此取长补短的必要,同时又可以避免华夏文化中心论和欧洲文化中心论这样两种错误倾向。

2、学习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方法。

我们认为,尽管各人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其效果也不尽一致,但概括起来说,学习研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大体需要有如下几种方法。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作出科学的阐述,而不能受什么“文化史观”、“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等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来进行唯心主义的阐释。这是因为,文化是对经济和政治的集中表现。人们的观念意识是在客观存在中形成起来的,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只有坚持这种观点,才能唯物地解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切现象。如果凭想象,从先验出发,对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作出随心所欲的考察,那么就很难真正反映出它的客观实际,作出的结论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就有可能夸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不利和。

二是要以辩证法为原则,克服片面性和简单化。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西方有西方的文化,中国有中国的文化。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又有进

步与落后之分,精华与糟粕之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在文化史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形而上学的观点。那些坚持传统文化是人本主义的人,看不到“五四”运动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抨击孔孟儒学的历史功绩而对其反封建的进步性予以全盘否定。有的人认为,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是运用儒学说的结果,看不到这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发展的作用。有的人看到外国某些学者强调中庸、伦理精神的巨大价值,就觉得中国可以用儒家学说来搞现代化,不需要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了。

与此相对立,那种持中国传统文化与封建主义等同观点的人,看不到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看不到近代以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变化,无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已是我国社会主流这一客观实际,片面夸大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封建性现象所占的比重,从而全面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伦理道德规范,宣扬以个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的人认为外国什么都好,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尤其是科学技术都不如西方。有的人在对中西文化伦理观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只看到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限制竞争机制的一面,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看不到西方资产阶级见利忘义,弄虚作假,尔虞我诈的危害性,从而大肆鼓吹全盘西化等等。

上述两种错误倾向,都是片面看问题、缺乏辩证法观点的结果。在学习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时,我们一定要克服片面性,坚持辩证法。因为,片面性将夸大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而鼓励盲目排外,使自己变得狂妄无知;与此同时,片面性又将夸大民族文化的消极面和西方文化的全盘进步,而使我们变得妄自菲薄,失去民族自信心,拜倒在国际资产阶级脚下,乃至失去国格、人格而不知羞耻为何物。因此,我们在学习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时,有必要多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会告诉我们以历史的现点、辩证的观点,科学而冷静地分析文化史上出现的诸多问题,总结

历史的经验教训用以提高自身素质,减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些失误。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缺乏正确理论为指导的学习方法,单凭个人兴趣或喜恶,是很难研究好中西文化交流史的。

进而,学习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时,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外,还应重视掌握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外交学、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多看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在增强丰富基本知识的同时,了解掌握其理论和方法。这样,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习和研究,有会少走弯路,就会有广度和深度。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铁骑西下与民族大迁徙	(1)
第一节 蒙古人的三次西征	(1)
一、成吉思汗的西征	(1)
二、拔都的西征	(3)
三、旭烈兀的西征	(4)
第二节 民族大迁徙在东西方	(5)
一、欧洲、中东和中国的民族迁徙	(6)
二、阿拉伯人的东迁与中国回回民族的形成	(11)
三、色目人在元王朝	(13)
四、欧亚文化汇集的钦察汗国	(15)
五、传递中国、波斯、阿拉伯文化的伊儿汗国	(17)
第二章 元帝国的对外交往	(20)
第一节 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	(20)
一、横贯欧亚的驿传	(21)
二、元驿与欧亚交通	(22)
三、市舶司与海运	(23)
第二节 传递东方文明的物质载体	(30)
一、风行世界的丝绸	(31)
二、名噪全球的瓷器	(32)
三、人口的移居	(34)

第三节 向国人介绍世界的西行者	(36)
一、耶律楚材与他的《西游录》	(37)
二、邱处机与《长春真人西游记》	(38)
三、汪大渊与《岛夷志略》	(39)
四、常德奉使波斯及刘郁所录《西使记》	(40)
第四节 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外国人	(41)
一、马可波罗父子与《马可波罗游记》	(41)
二、“伊斯兰世界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与《环游胜览》	(44)
三、波斯人志费尼与《世界征服者史》	(45)
四、欧洲商人裴哥罗梯与《通商指南》	(46)
五、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的《海屯行纪》	(47)
第三章 元代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	(49)
第一节 元代伊斯兰教在华分布概况	(49)
一、漠北地区之穆斯林	(50)
二、西北地区之穆斯林	(50)
三、中原地区之穆斯林	(51)
四、西南地区之穆斯林	(51)
五、江南地区之穆斯林	(52)
第二节 元代穆斯林的政治社会地位	(53)
一、设置专官	(54)
二、享有优越待遇	(54)
三、具有宽松的传教环境	(55)
第三节 杰出的穆斯林文化名人	(57)
一、为云南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赡思丁父子	(57)
二、学贯儒学、法学、科学的赡思	(58)
三、名臣、儒学家不忽木父子	(58)
四、元季诗坛巨子丁鹤年	(59)